

抗战时期的贵阳文艺界

□吴纯俭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敌寇长驱直入。大批文化人陆续来到贵阳,有些是取道贵阳而去重庆的。他们有:巴金、田汉、安娥、熊佛西、端木蕻良、方殷、秦牧等;再加上贵阳原有的一些作家,山城文艺界的空气,活跃空前。

一、最早的文艺团体

当时贵阳最早出现的文艺团体,是1940年2月成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这个组织的总会设在重庆,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个分会。主持贵州分会的筹备负责人主要有:谢六逸、蹇先艾、齐同、李青崖、张梦麟、刘熏宇等。分会的任务是:组织和号召贵州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参加抗日宣传和敌斗争。分会成立以后,由谢六逸编辑出版了几期会刊,并亲自写了几篇文章。会刊上还发表了蹇先艾的《新的战斗的堡垒》,对当时贵阳文艺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曾起过一定积极的作用。

二、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

这一时期,贵阳的作家们,在几家主要报纸上编辑了进步文艺副刊,1938年,由谢六逸、蹇先艾、齐同、李青崖等发起并主编了《贵州晨报》的文艺副刊《每周文艺》。这个副刊,为团结我省文艺工作者和帮助青年学习,写作,起过一定作用。当时谢六逸是从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的学院院长(后任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曾用“鲁愚”的笔名,为这个副刊写过不少杂文,引起广大读者重视。到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州晨报》被毁,随之停刊。《晨报》停刊后,改出《革命日报》,由路尔钰主编,后杨森来黔,又改为《贵州日报》。1944年左右,在贵州大学

教书的蹇先艾,主编《贵州日报》进步文艺副刊《新垒》,每周出刊一次,这个副刊不仅团结了一批省内外的老作家,同时更主要的是培养了一批本省的青年作者。蹇先艾对来稿,看得非常仔细,惟恐偶一疏忽,埋没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作者。他还四处向老作家约稿,写编后记,《新垒》办得有声有色。撰稿的除有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臧克家等一批著名作家外,还有田井卉、采风官等一批遍布省内的青年作者。

在贵阳,除了上面所谈的主要报刊的文艺副刊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老诗人方敬在贵阳《大刚报》上主编的进步文艺副刊《阵地》。方敬当时是贵州大学外文系教授,在他主编期间,发表过包括艾芜、臧克家等一批名家的作品,有时为汉口《大刚报》整版转载,还编了一个令国民党惊呼为“普罗作家”茅盾五十寿辰的专刊,使国民党当局狂吠什么“贵阳本来是一杯清水,现在却给《大刚报》的文学副刊‘阵地’搅浑了!”由于国民党的蓄意加害,方敬只编了三年左右,终于被迫离去。方敬离去后,接编《阵地》的是欧阳柏。一年后,抗战胜利,欧阳返回南京,接编的是当时贵州大学的一个讲师姓沈的,从此以后,这个副刊的质量,也就一落千丈了。

当时贵阳,还有两个副刊:一个是《中央日报》上的《前路》,主编是陈逸檀。只记得四十年代时,巴金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揭露当时贵阳某家医院因医疗事故致病人死于非命的小说,这篇小说,曾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纷纷要求有关单位严肃处理,致使国民党惊恐万状。当然,像这类事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的。另一个是《力报》办的副刊。《力报》最初是1945年由戏剧家熊佛西在遵义时办的一家民营报纸,当时由端木蕻良为《力报》社主任,他写过《最古的宝典》。现在的著名散文家秦牧,路过遵义,就住在这个报社的临时编辑部里一个时候。熊佛西

经办时期的《力报》副刊，办得很出色。但后来终因经费不足，只办了一两个月就停刊了。以后这家报纸，由贵阳一家出版商接办，《力报》的副刊，记得似乎是由胡危舟主编。

三、主要文艺刊物

关于抗战时期的文艺刊物，当时主要有：一九四五年由潘家洵、吕荧、方敬、祖文等发起并主编的《时代周报》。潘是当时贵州大学的文学院长，三十年代时研究易卜生的专家，是《娜拉》剧本的最早翻译者。吕是贵大教授。这个刊物，一开始就以崭新的进步思想面貌出现，它强烈地反对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支持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抗议国民党在昆明制造的“闻（一多）、李（公仆）事件”。《时代周报》一创刊，就引起国民党的很大震动，并扬言什么“闻一多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把老命都丢掉了，你们还要办什么《时代周报》！”于是，贵阳白色恐怖，一时甚嚣尘上，弥漫整个山城，敌人伸出的罪恶黑手迫害作家和爱国进步人士。纵使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却更炽烈地燃烧起来了。但作为进步文艺刊物的《时代周报》，终于因遭受迫害而中途夭折了。

《文讯》月刊，也是当时贵阳的一个主要文艺刊物。它原是在上海出版，由臧克家主编，上海文通书局发行。因为文通书局总店和发行人华问渠都在贵阳，所以这个刊物在贵阳的发行量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大。另外要提到的是《离骚》文艺月刊。这个刊物由李麦宁主编，陈海涵发行。李原是一个中学教员，后失业赋闲在家。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名为月刊，其实经常不能如期出版。且由于私人经营，最后终因经费拮据而被迫停刊。

最后，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的筑光音乐会、骆驼剧社，以及贵州大学进步文艺团体“狂飙”、“高原”等，对当时抗日宣传活动和以后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运动，都曾经起到团结对敌、斗争的积极作用。

《读书郎》 创作于黔中

□李业成

“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这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四十年代就流传全国，至今仍是全国小学生必唱的音乐教材。我们贵州人、特别是安顺一带的人们听到这首歌，倍感亲切，因为这首歌是革命音乐家宋扬四十年代在贵州安顺的苗族村寨汪家山创作的。

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演剧四队的一批音乐家和文艺工作者，如舒模、宋扬、葛敏、张客、农中南、邱家铎、黄鉴等来到贵州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冬，他们深入安顺苗族村寨，看到人民群众苦难的生活，激发了创作的激情。宋扬同志先后创作了《读书郎》和《苦命的苗家》等歌曲。这些具有安顺地方风味和苗族特色的歌曲，最初是由苗族同胞用苗语唱出，然后在汉族群众中唱开的。你听《读书郎》这首歌的曲调、旋律、节奏，与苗族芦笙舞曲是多么接近啊。那“纳朵纳朵纳”的基调不正象芦笙吹出的自然音调？所以很多年来，人们还一直以为它是苗族民歌呢。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置身于革命熔炉，从实际生活中吸取养料，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反过来又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剧宣四队的同志、如葛敏等人向苗族同胞学跳苗族舞，学吹芦笙，与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宋扬和葛敏还在苗寨认了亲戚。1946年正月十五，演剧四队的同志与苗族同胞共度佳节。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他们在篝火旁演出了活报剧《敌人暴